



本期发表汪晓军的《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是应当时常修习的功课》和刘海栖的《怎样写活军旅儿童文学一议》。

经典阅读、童心本位、文学语言,都是儿童文学生活里的老话题,但是,两位作者同为儿童文学作家,也都曾多年从事童书出版工作,却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些“老话题”,应该也是有感而发的。

文中提出的“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特点,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是应当时常修习的功课”“没有好的语言,“小说叙事就可能失去生活气息甚至文学魂魄”等观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在近年来的主题创作和出版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套路化”的写作,看到了远离生活和人物特点的“公共化”叙事语言。因此,如何避免因主题、题材的“阔大”而“远离”童年,如何避免创作仅有热情、“胆量”而忽视语言的基本要求和打磨,仍然是今天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中亟须面对和思考的艺术课题。

——方卫平



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 是应当时常修习的功课

□汪晓军

讨论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重视创作者、出版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前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实际上决定着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的作业态度、作业水平,以及作业质量和效益。就我读过的一些主题创作与出版的相关作品,明显看得出来,出版者宣传推广强势而不遗余力,他们特别渲染和强调作品的题材分量,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儿童本位出发的对于作品的文本品评及效益评估,这就使得这一类作品似乎叙事宏大有气势、响应热烈声势大,而实际上却缺少儿童读者的真实认同与由衷感动。

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由于同时开始重视创作和出版两个作业主体,也就有了提升选题策划能力、创作表现能力以及传播推广能力的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儿童文学提升这三大能力,就是新时代的要求。这样的高标准,也是对创作者和出版者新的期许,要求努力提升作业水平和效益。正因如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特点,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出版者在推进主题出版工程的时候,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要求,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提升选题策划能力的重心,侧重于出版策划,成为出版者协同创作者围绕重点工程、重大活动、重要节日等策划相应选题。这样做,似乎是扩大了儿童文学选题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些选题是否确实是面向儿童读者的,有多少儿童的文学的成色,也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有一阵子,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挺热闹。一个标志是,题材广泛了,尤其是一些重大选题赫然而出,先声夺人。还有一个标志,是“跨界”写作时兴,成为一时风尚。实际的情况是,各地方出版者倾力宣传推广的儿童小说,质量参差,佳作甚少,缺的是儿童读者真正适读的作品,真正吸引儿童读者的精品佳作,仍然凤毛麟角。尤其是,一些“跨界”作家,由于在其他文学领域的成绩,特别引人注目,而他们应出版者邀约创作的儿童小说,实际的表现却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开笔不凡,叙事场景设置独具特色,应当是很能引起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的。但是很可惜,具体叙述鲜活情节的时候,我的阅读期待里的精彩叙事,并没有明白晓畅地表述出来。有的作家以为弯下腰与小读者说话,会显得亲切得体,殊不知这并不是平等对话,反而影响了与小读者自然顺畅的交流。

儿童本位的意思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首先要学会尊重、了解和熟悉儿童读者。儿童文学作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在具体创作中实现与小读者的成功交流。尊重才能了解,了解才会熟悉,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出版者,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倾注心力、情感,推出儿童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

一般说来,优秀的作家,都是可以获得成年人和少年儿童读者认可和喜爱的。这是由作家的经历、素养及性格禀赋决定的。我国有影响力的作家当中,在儿童文学领域和其他文学领域都有建树的大有人在,他们在两个领域之间自由穿梭,时有精品力作,也很寻常。比如《小英雄雨来》的作者管桦,塑造了活泼感人的雨来形象,受到小读者喜爱,也创作出《辛俊地》这样的优秀小说,丰富了新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写出《小兵张嘎》的徐光耀,之前就出版过《平原烈火》,声名远扬。新时期以来,写出《黑黑白白》《长恨歌》的王安忆,写出《古船》《寻找鱼王》的张炜,比比皆是,而进入新时代,他们还有佳作不断推出。作家进入一个领域的写作,首先要熟悉那个领域读者的阅读特点,这样进入创作便能深入浅出、游刃有余,写出直抵那个领域读者心灵的作品。对于从事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的创作者和出版者来说,如果缺少这样的积累禀赋,就要向前看齐,抓紧补课,补上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的功课,珍视童年,进而熟悉儿童,尊重儿童的阅读接受状态,从而拿出适读儿童读者的作品,引领儿童的阅读审美。

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是应当时常修习的功课。我们倡导阅读经典,看重的是经典作品的历史影响力和代表性,视之为儿童增益认知、丰富审美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儿童文学写作的良好范本和童年资源。学者方卫平曾说:“童年的秘密从来不会停留在任何抽象的理论中,而永远是在孩子生动的日常生活里,在孩子蓬勃的生命状态中。”(《发现童年的秘密》)作家赵燕翼提倡修养童心时谈道:“儿童文学作家要做一个修养童心的人,要把修养童心当作毕生的功课。”(《我与燕翼老师》)如此说来,时常阅读经典和修养童心,就算是有了准备,可以顺利进入儿童文学的写作及编辑出版活动,增加积累,丰沛禀赋,有朝一日,终有所获。

(作者系中共党史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怎样写活军旅儿童文学一议

□刘海栖

形容骄傲,说尾巴翘到天上了。不算完,还要加上,把天捅得砰砰响。听着让人想起用棍子捅屋顶棚。比如饲养员不安心工作,把猪养得脊背薄如刀片,一米多高的猪圈墙一跃而过。这个细节我是听先进报告时听到的,后来用在了小说里。

常用歇后语,如自谦附骥尾,说成龙尾巴上的虾米,跟着混上天。当然,有些歇后语不适宜,很难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里。

对话多用短句,不啰唆,不追求语义完整,往往只说半句。如我在作训科时,搞演习,作战参谋向首长介绍战场态势,总是把敌方阵地部署的大卫克罗克特式导弹说成大卫克,大卫克在这里,大卫克在那里,听上去像叫小狗。

如果没有基层连队生活经历,对基层官兵缺乏了解,典型的部队生活是难以体会到的。我有所体会,但也不全面。我在给孩子们写打篮球这些活动时,体会多,用得多,比如《三步上篮》里写到打篮球的情景。老父亲说,掏他一个营部,挖他一个团给战士涨涨士气,都是用动词的例子。我写,首长说,打起仗要脸不要命,打篮球也一样。这类语言又形象又提气,是字里的“眼”。

另外,学生兵有学生兵的语言,农村兵有农村兵的语言,最后大家相处成大体流通的基层官兵语言。语感往后者靠,词汇向前者移。

脱离了语言环境的语言不是好语言,语感上不能一气贯通,磕磕绊绊的语言不是好语言,只堆砌词语的语言不是好语言。该顺则顺,该拙则拙,灵活闪动,沉着准确,不浅不水,可供思索,就是好语言。

我很怀念早期我读的那些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那些作家是泡在部队生活里面成长的。语言是为故事为情节和人物服务的,只有它们统一,才能呈现出一个好的文本。生活极其重要,小说里所有的呈现都应该来源于或脱胎于生活。这个生活可以是亲身经历,也可以是听来的,但听来的也是建立在与自己同频共振基础上的。作者不能当万金油,什么都碰,那是空对空。

主题写作也是这样,光有胆量,什么热门写什么肯定不行,还要问问你的生活积累够不够,你的写作经验和智慧是否扛得起来。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从“被看见的对象”到“被理解的主体”

——浅谈原创图画书的现实主义精神

□吕 兰

图画书是一种以文图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艺术形式。一般认为,2008年前后是中国原创图画书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的重要起点。十余年来,本土图画书创作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与审美取向上不断深化,其原创性的逐步增强,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持续探索密切相关。

相较于儿童小说、童话等文体,图画书在中国真正形成规模化创作与接受的时间较晚,其发展已置身于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观念多次演进之后,占据着反思性的表达立场。与此同时,得益于图画书的多模态特性,其在视觉、叙事与情感层面的协同运作,使儿童读者在感知与理解现实经验时,能够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心理认知。因此,图画书所呈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局限于现实题材本身,而是一种源自现实、指向现实的儿童性表达立场。此立场强调真实、同情与关怀,以及现实经验的可感知性、可承受性和可迁移性。

日常的现实如何进入儿童经验

现实主义在图画书中的新质,首先体现为一种以地方性和感官经验为起点的现实理解路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图画书为故事设置明确的发生地,这种在地性的强化并未削弱想象力,反而为故事提供了更为稳固的现实根基,使人们认识到儿童的情感体验与具体生活世界的牢固联系。这一趋势对儿童读者来说,有利于将他们的阅读感知与真实的社会空间连接起来,在连续的视觉呈现中感受深植于地方文化的童年精神气质,逐步认识现实的多样性。例如,《爸爸的茶园在山顶》(徐斌著、俞寅绘,2023年)通过采茶时指尖的黏痛、午间泉水的清冽等感官细节,呈现出山地劳动中坚韧而舒展的生命节奏;《喀什寻迹》(查璇著/绘,2024年)则借由巴扎的烟火气与即兴歌舞,营造出松弛而热忱的古城人文氛围。这些作品呈现的,并不是对现实环境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以儿童性为核心视点的生活感受。

地方性与感官经验奠定了儿童现实理解基础,图画书的视觉叙事结构则能更好地参与对复杂现实的整体书写。因为相较于以情节推进为主的叙事,图画书更强调空间关系与时间秩序的可视化呈现,通过画面并置、翻页展示与节奏安排,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逐步理解自然、社会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邱承宗的生态绘本以空间剖面的方式呈现自然系统的内在结构,《盘中餐》(于虹呈著/绘,2016年)通过物候时序的展开,将日常饮食置入更长的自然与劳动链条之中,二者均显示出图画书在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之间进行视觉转换的能力。从新疆皮勒村的地方生活叙事《驼背上的梦想》(舒春著、刘向伟绘,2023年),到深圳小渔村的时代变迁书写《大船》,黄小衡著、贵国子绘(2019年),再到毛乌素沙漠治理图景《绿色的毛乌素》(段雪飞著/绘,2022年),这些作品通过空间变迁与视角并置,将个体生活置于时代进程之中加以观照,使儿童在差异性的生活经验中感知世界的共在状态。

在感官经验与视觉叙事的共同作用下,图画书还通过独特的文本设计,参与儿童对现实逻辑的理解过程。图画书往往通过翻页所带来的悬念和反转,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逐步体会现实中的真假事件和他者处境,从而在情感参与中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例如,《牛言·蜚语》(许蚕原作、奇伟改编/绘,2022年)通过视角颠倒与双重结局的设置,引导儿童意识到单一叙述并不能穷尽事实真相,使儿童在反复阅读中主动思考现实表象之下的多种可能。在《小丑·兔子·魔术师》(林秀穗著、廖健宏绘,2018年)多线交汇式的时空书写中,儿童需在视觉选择与关系判断中理解现实。《这里,那里》(卢心远著/绘,2022年)通过可并行阅读的页面结构,将不同人生经验并置于同一叙事空间之中,鼓励儿童尊重、理解他者的经验。由此,图画书通过页面设置建构的开放性叙事,不仅拓展了儿童理解现实的路径,也使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在阅读过程中逐步显现,让其可感知、可理解。

沉重的现实如何以可承受的方式讲述

明晰了图画书的艺术特性对日常现实经验的适应、转化后,如何在现实主义精神指导下让图画书承载儿童经验便成为关键问题。图画书主要面向幼儿和学龄儿童,意味着它需要触及更早的、更难用语言表达自我的生命阶段。那么如何呈现这些年齡段的孩子面临的一些在情感上难以承受、在叙事上不易展开的现实议题,如失落、创伤等处境?

作为一种常被置于“睡前阅读”情境中的文本,图画书原本携带着温暖、慰藉与想象性的情感基调。因此,当它在有限篇幅中直面生活的艰难与不完满时,往往并不强化冲突,而是通过语图叙述空白中幽默感的衍生和情感克制,使现实以一种可承受的方式进入儿童经验。《我和我的脚踏车》(叶安德著/绘,2011年)并未正面放大贫穷带来的失落,而是通过孩子对母亲处境的理解以及“神灯许愿”中略带黑色幽默的天真想象,让失望被包裹在成长的收获感之中。翻页的空白设计可以创造“隐喻”的效果,《小黑鸡》(于虹呈著/绘,2019年)中鸡的家人被吃掉的残酷事实,是通过猫的页面行动轨迹和空白来呈现的,文字中“找不到了”标示空白暗示的恐惧和危险。一些具有成熟儿童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加盟,则催生出如《麻雀》(梅子涵著、满涛绘,2015年)、《桃花鱼婆婆》(彭学军著、马鹏浩绘,2017年)、《乌鸦眼》(曹文轩著、任保海绘,2024年)等深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一方面,这种创作趋势使图画书的文字在叙事层次上更为深厚,承担着现实的张力;另一方面,带来了情感基调的变化,促成了独具风格的视觉传达。

在现实以可承受的方式进入儿童经验之后,图画书需要面对的,便不仅是个体困境的呈现,而是儿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这一表现难题在于儿童弱势地位、心理创伤与残障、留守等边缘

身份的叠加,成人创作者需要建构一种可信、可靠的伦理立场,并能将其转化为普通读者可感知的情感体验。《父亲的月光》(罗榕榕著/绘,2024年)正是通过月亮这一美感的存在,让天生残疾的男孩领悟自身的存在,并赋予读者希望。《青蛙小王子》(刘清彦著、六十九绘,2020年)则在童话结构中引入妥瑞综合征儿童的形象,使“特殊性”得以进入熟悉的叙事框架。相较于文字符号,视觉形象可直接呈现心理状态与行为姿态,而审美化呈现可以唤起读者的愉悦,从而实现儿童的身份议题从“被看见的对象”深化为“可被理解的主体”。

图画书也发挥注重细节的长处,通过“物”的叙事视角表达宏阔的时代情绪。《电线杆去哪儿了?》(李含著/绘,2024年)以电线杆的第一人称自述串联起城市现代化的景观,画面以冷静克制的风格呈现电线杆的变化,而文字则赋予这一“无生命之物”以温和、朴素的情感色彩。电线杆从被需要、被依赖,到被忽视、被替代,其“消失”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技术更新的结果。通过这种借物抒情的文图关系,作品避免了对社会变迁的抽象论述,而是在告别与沉默中唤起一种含蓄而深远的时代情绪。可见,图画书凭借多模态艺术特征在物质的现实书写上拓进,获得更丰富的介入现实的途径。

走向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

如果图画书能够讲好日常与沉重的现实,便自然具备了跨文化接受的可能性。换言之,原创图画书在现实主义精神上的成熟,使其不再依附于特定文化符号的解释,而是以儿童经验为中介进入跨文化理解的结构之中。在更大的价值尺度中审视现实主义精神,有助于我们总结可迁移的创作经验。

现实主义精神的辩证性在于,高度在地的生活细节,恰恰最容易被跨文化理解。原创图画书对市民街景的持续书写,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街景、集市等题材高度契合图画书以情景认知为核心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这类视觉书写

又延续了中国传统风俗画的现实主义倾向。以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2006年)为代表,这类作品通过对食物、器物、服饰、职业与建筑的密集呈现,在画面关系中自然勾连起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人际秩序,是一种社会缩影。在此基础上,市民街景的书写不断向当代生活延展。《西西》(萧袤著,李春苗、张彦红绘,2008年)“密集地”表现当代儿童游戏的情态;《你看见喜鹊了吗?》(戴芸著、郁蓉绘,2023年)通过长卷式的历史想象,使中国儿童形象被重新观看。因为集市、街景可以容纳儿童身体及气味、声音等感知,这些构成了儿童经验中最具通感性的现实形态。《冀娃子》(刘渝著/绘,2017年)、《我和爸爸逛巴扎》(周翔著/绘,2023年)等诸多作品也是如此唤起儿童对现实环境的整体感知,表明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已进行了有效的经验总结。

这些源于具体生活场域的经验,即便脱离原有文化语境,仍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重新凝练,并在代际差异与文化调适中持续彰显现实主义精神。华裔创作者的图画书为此提供了有力验证。在《西洋菜》(陈郁如著、陈振绘,2021年)中,孩子最初无法理解父母关于贫困与节俭的记忆,也难以承受异样目光带来的心理压力,但随着家族历史被逐步讲述,日常饮食转化为理解他者处境的入口,从而重建起亲代之间的情感联系。类似的作品还有《午餐盒里的中国味道》(少君著/绘,小奇译,2026年),二者都将食物作为连接两代人家庭记忆、移民经验与儿童当下生活的情感触点。在此,食物并非文化符号的简单展示,而是一种可被儿童身体感知、可被反复体验的现实媒介。

可见,现实主义精神融入图画书后,赋予了现实经验可感知性、可承受性与可迁移性,并创造出具有原创力的精神标识,进一步助推原创图画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ZD275)阶段性成果]